

伏尔泰悲剧《中国孤儿》中的矛盾哲学

唐果

(四川外国语大学 法意语系,重庆 400031)

摘 要:本文以伏尔泰创作的悲剧《中国孤儿》为研究对象,对戏剧史料和剧院上演数据进行整理,全面剖析《中国孤儿》在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戏剧是直接影响群众的最好手段,既可以针砭时弊,又可以鼓励行动,由于每个时期观众的需求和戏剧环境的不同,《中国孤儿》演出的数量在不同的时间段也有所波动,尤其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反差最为明显。此现象从侧面说明了伏尔泰社会政治观点的两面性,反映了当时大资产阶级既反对封建专制王权又害怕革命的实质。本文对法兰西喜剧院剧目索引的整理以及对《中国孤儿》戏剧史料进行钩稽,致力于完整呈现出《中国孤儿》在法国大革命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前后的演出波动情况,探索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而评估此剧的思想,社会与美学价值。

关键词:伏尔泰;《中国孤儿》;法国大革命;启蒙思想;二元性

中图分类号:I565.0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9)04-0071-07

0 引言

18 世纪中期,法国知名汉学家马若瑟(Père Prémare)通过翻译首部中国古典悲剧《赵氏孤儿》成就了欧洲汉学界的一项壮举。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欧洲剧作家对《赵氏孤儿》进行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改编。伏尔泰一生写剧、演剧,希望继高乃依和拉辛之后,成为戏剧领域里又一位不朽的悲剧诗人。当他看到马若瑟《赵氏孤儿》的法译本后既感动又兴奋,决意把这部宏大的中国古典悲剧搬上法国舞台。1755 年,伏尔泰创作的《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孙惠柱在研究伏尔泰跨文化戏剧时总结道:“伏尔泰对东方的了解虽然肤浅,但他的剧作宣扬文化宽容,挑战占统治地位的丑化东方人的观念,成就卓著。”(孙惠柱,2004:27)从《中国孤儿》剧本中,我们不仅看到伏尔泰对中国的浪漫化,特别是感受到他在接受《赵氏孤儿》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角色,而是推动新文学创作的主体动力。

伏尔泰创作的《中国孤儿》不仅与法国古典戏剧完美融合,还加进了先进的启蒙思想元素,引起了法国观众的特别关注和喜爱,在上映当年风靡一时,并作为经典剧目进行公演,热度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前期。然而,《中国孤儿》虽然体现了伏尔泰对封建专制的不满,不少的场景却显示了他的启蒙思想带有革命的不彻底性,这也导致了《中国孤儿》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后十年期间,遭到法国观众的抵制。目前,国内外已有的关于《中国孤儿》剧本的研究,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以钱林森《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中法文学的首次交融》(1988:117-129)为代表,以伏尔泰的剧本为契机,探讨 18 世纪法国社会吹起的一股“中国热”。第二,以叶坦《对伏尔泰及其〈中国孤儿〉的再认识》(2000:67-71)为代表,对比伏尔泰《中国孤儿》与中国元曲《赵氏孤儿》的异同。第三,以黄意明《理想中国的图画——伏尔泰的〈中国孤儿〉》(2000:72-78)为代表,勾勒伏尔泰心中向往的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美丽蓝图。迄今为止,还未有学者研究《中国孤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接受度并由此探索伏尔泰政治观念的二元性。本文将根据大革命前后观众的心理变化趋势,探索影响《中国孤儿》观赏的各种社会和技术因素。轰轰烈烈的法国大

收稿日期:2019-01-21

基金项目:四川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十八世纪法国翻译理念框架下元杂剧《赵氏孤儿》法译本研究”(SISU2018041)、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市级一流学科项目“中国戏剧在启蒙时代西方悲剧文体演变中的推进作用研究”(SISUWYJY2019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唐果,女,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意大利语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启蒙时代法国文学研究。

革命以疾风暴雨般的速度推翻了法国近千年的封建王朝,在这一场巨大的变革中,伏剧《中国孤儿》作为旧制度文化艺术的载体,经历了法国人民怎样的对待? 本文通过整理《中国孤儿》在法兰西喜剧院的上演数据,归纳当时刊物、报纸等相关历史资料,从而对此剧在法国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

1 《中国孤儿》上映场次数据整体分析

法兰西喜剧院作为法国第一国家剧院,其剧目的上演次数是广大观众喜爱度最直观的反应。因此,将《中国孤儿》的上演场次曲线完备地重予考释,无论对提供戏剧研究史料,还是对正确评估剧本的价值,都十分必要。表 1 显示从 1755 年《中国孤儿》登上剧院舞台至 1855 年这一百年间,法兰西喜剧院始终活跃着这个常看常新的剧目:

表 1 法兰西喜剧院 1751—1850 年上演《中国孤儿》的场次统计

年份	演出场数总计
1751—1760	45
1761—1770	21
1771—1780	27
1781—1790	40
1791—1800	4
1801—1810	14
1811—1820	14
1821—1830	8
1831—1840	2
1841—1850	0

(此表根据 Joannides 著作《1680—1900 法兰西喜剧院》提供数据梳理建立)

表 2 中数字曲线的波动也具有较强的指示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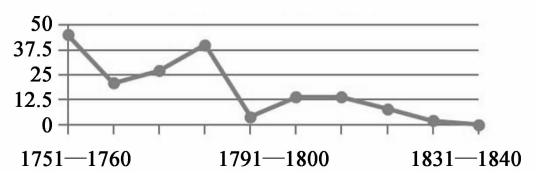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孤儿》场次统计 (1751—1850)

《中国孤儿》于 1755 年第一次在法国上演,最初五年的 45 次演出场次见证了此剧在法国国家戏剧舞台上决定性的胜利,一位剧作家甚至这样描写当时的演出盛况:“举国都来了,上演伏尔泰的这出悲剧是件国家的大事”(黄意明,2000:72)。从 1761 年到 1780 年,《中国孤儿》的上演场次体现了一定的规律性:1761 年到 1770 年间共计 21 场;1771 年到 1780 年 10 年间共计 27 场。从 1781 年开始至 1790 年,公众突然对此剧表现出莫大的热情,导致此剧年年加场上演,并获得 40 场演出的辉煌战绩。然而,1791 年陡然间,法国观众似乎对《中国孤儿》失去了兴趣,甚至表现出一些抵制,直到 1810 年,《中国孤儿》仅有四场排演。将近 20 年的沉寂,《中国孤儿》于 1811 年重登舞台,1811 年至 1820 年间上演 14 次,1821 年至 1830 年间上演 14 次。从此,随着时间的久远,《中国孤儿》的影响开始减弱并逐渐从法兰西喜剧院固定演出目录中消失。通过对图表的简要梳理,可以看出有两个时期特别值得我们关注:1781 至 1790 年间上演场次突然爆发式增长的十年;以及 1791 年至 1800 年间断崖式下跌的十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 年)前十年与后十年。

虽然伏尔泰作为法国 18 世纪中期的作家,其一生主要活动并不是处在大革命爆发时期。然而,伏尔泰的社会政治伦理“呼吁人们崇尚理性与文明,反对神权和野蛮”,因此成为法国大革命的一份“酵母”(陈建

伟,2017:44)。法国大革命是一段社会激进与政治动荡的时期,绝对君主制与封建制度土崩瓦解,革命导致共和派和保皇派各界对立。伏尔泰《中国孤儿》中对封建、贵族和宗教特权的批评,对自由、平等、博爱等新原则的推崇,以及对开明君主制的宣扬都导致了此剧在大革命前后剧烈波动。笔者以发展的眼光深入研究此剧在大革命时期的不稳定因素,并摸索其背后的社会原因。

2 1781—1790 年:大革命前期辉煌的十年(40 场演出)

《中国孤儿》上演数量的第一次显著上升出现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夕。首先,《中国孤儿》是伏尔泰少数几部在大革命来临之前连续上演的戏剧之一。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状况,指出“变迁、结构、话语”三大要素,其中社会变迁主要指旧制度无法满足持续上升的需求,人们就产生相对剥夺感而趋向变革(托克维尔,1992:7)。《中国孤儿》中成吉思汗所领导的蒙古族代表社会结构分成中的中央集权政治层,汉族人咎悌和伊达美代表与统治阶级分裂的阶层,整个国家缺乏中间地带的缓冲,开篇所描写的汉族人民反抗势头直击暴君制。话语上,《中国孤儿》剧本充满流行的“文学政治”,要求自由和平等,容易激起法国观众的变革热忱。《中国孤儿》高达 40 场的出演证实法国旧制度与第三阶级的冲突造成了法国观众对此剧价值的重新解读。

在法国大革命即将来临的前夕,革命者肯定了戏剧文学作为宣传手段的作用,提出“戏剧应该教育民众”的口号。维拉特(Vilate)在其著作《九日十日热月革命延续的秘密原因》中多次提及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维拉特指出,即使大革命爆发时伏尔泰已经仙逝,但《中国孤儿》的成功有力地证明戏剧作品在政治起义中的作用:“伏尔泰!我像你的亡灵祷告,你的著作如若浩瀚的海洋,你是革命的先行者,然而,你会想到有一天你的天才杰作将被投进捕食者的滚滚烈焰下吗?你在创作《中国孤儿》的时候,是否也想通过鞑靼王成吉思汗的劣行向你自己国家的立法者以示警讯,告诫他们保护艺术和文学的重要性?”(Vilate,1825:237)。维拉特的评论映射的正是《中国孤儿》中抨击鞑靼残害公共文明的场面。如开场第一幕,伊达美哭诉成吉思汗的黑暗统治:

第一场 第一幕

伊达美:

也许,在这个荒凉的时刻,
在这个屠杀和毁灭的日子,
当鞑靼人血腥的打开宫殿,
整个世界都在这群野蛮人前倒塌,
在这恐怖可怕的气氛下,
还有什么更痛楚的事吗?(Voltaire,2009:125)

成吉思汗统一中原大陆的过程充满着血腥的野蛮行径。伏尔泰曾仔细阅读过 18 世纪传教士杜哈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此“汉学巨著作为 18 世纪欧洲人中国知识重要来源”(张明明,2015:92),对蒙古帝国攻击中原文明社会做了详尽的描写。伏尔泰生前对中国文化的偏爱使他对《中华帝国全志》如痴如醉,并从中吸取灵感改编了纪君祥写的元杂剧《赵氏孤儿》。伏尔泰《中国孤儿》中的成吉思汗以一个恶人形象登场,其领军的蒙古武士是一些“野蛮的掠夺者,他们住在帐篷中,住在战车上,住在草地里”(Voltaire,2009:89),他们“憎恶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习俗和我们的法律;因此他们企图把这些东西全部毁灭”(Voltaire,2009:113)。简而言之,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对残暴之徒玷污文学艺术的劫掠行径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作为被压迫者的保护人,伏尔泰认为最理想的政体是由开明的君主按哲学家的意见来保护文学和思想。因此,法国大革命酝酿期间《中国孤儿》多次加场演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即是剧中对破坏文学禁锢思想行径的抨击。

再次,《中国孤儿》中汉族英雄咎悌(Zamti)和伊达美(Idamé)对生命尊严的珍视,在大革命前夕鼓励了众多革命战士。法国大革命吸引了一大批日内瓦上层资本家热情追随,捐献物质帮助,可谓是一支重要战

斗力量。1783年,日内瓦银行家同时也是著名革命家的爱田克拉夫被逮捕。入狱前,爱田克拉夫非常钟爱阅读伏尔泰的作品。在狱中,伏剧《中国孤儿》抨击社会现实,强调生命自由的观点更是成了他的精神支撑。《大革命时期现代史事新闻摘要》记载:“1783年12月8日,监狱看守以得知要处决的犯人姓名,其中包括爱田克拉夫。他得知消息后,愤怒地诅咒着这些刽子手,并举刀自杀。爱田克拉夫的革命同伴听到他在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前几分钟,高声朗诵《中国孤儿》的诗句”(A. Jay et al., 1821:432):

受惊的罪犯,等到他们的是折磨,

无畏的死刑犯,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这两句诗文出自《中国孤儿》第五场第五幕,咎悌和伊达美在等待成吉思汗的判决时,伊达美主动提出自杀:

第五场 第五幕

伊达美:

最耻辱的死亡就是别人为你准备的死亡

咎悌:

毫无疑问;我还在等待野蛮人

迟迟不来的决定

伊达美:

好!听我说:

我们难道只会死在暴君的命令下吗?

如同祭祀台上待宰的牛羊

受惊的罪犯,等到他们的是折磨,

无畏的死刑犯,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Voltaire, 2009:206-207)

这一幕作为《中国孤儿》的经典剧幕体现了启蒙运动和“自杀”认知的关系。18世纪法国对“自杀”态度的“世俗化”以及自杀的“去污名化”运动,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观念的进步。包括伏尔泰在内的众多18世纪哲学家号召“生命自由”的概念。“自杀”这一传统的“反宗教概念”经历了从中世纪的严苛到18世纪宽容的转变,主要原因是理性呼声的出现与权利意识的增强。伏尔泰在其浩瀚的著作中,常常呼吁人们摆脱宗教信仰的束缚,要用科学与理性的态度认知社会问题——“自杀”就是其中之一。伏尔泰首先指出自杀并不是反宗教的行为,因为“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从未禁止人类在无法忍受时停止自己的生命”(Voltaire, 1897:569),再次,追溯历史法典,伏尔泰强调“古罗马法律并不惩罚自杀”(Voltaire, 1877:162),最后,从道德层面,伏尔泰质疑到“从哲学层面上来看,一个人决定离开这个他无法再继续服务的社会,对社会又能产生什么危害呢?”(Voltaire, 1880:186)。在伏尔泰的社会理想内容中,“自由”是他反复提到的一个概念,而“自杀”行为则是人身基本权利之一。革命烈士爱田克拉夫在自我了断前高呼的《中国孤儿》两行名句包含了对旧制度的攻击,突出的是“走向自由”的伏式哲学。换言之,“爱田克拉夫事件”与《中国孤儿》里“伊达美事件”强烈呼应。面对暴君的审判,与其屈辱的苟活,不如灿烂的死去。这种对自杀行为的认知从“犯罪”到“权利”的历程,突出了伏尔泰多次强调的理念,既“人性的最大天赋就叫作自由”。

最后,《中国孤儿》剧末文明战胜暴政,极大地鼓舞了法国大革命的烈士。《中国孤儿》结尾,咎悌和伊达美从成吉思汗手中救下中国皇帝遗孤,也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前夕人民群众的乐观情绪。剧中反抗压迫的主题不仅激励了法国革命志士,也为美国独立战争提供了锐利的精神武器:“《中国孤儿》是第一部在美国舞台上上演的伏尔泰戏剧,第一次上演是在查尔斯顿,时间是1764年3月26日。四年后在费城上映并获得巨大反响。伏尔泰的这部代表性戏剧之所以在这两个城市获得成功,于这些地区的独立浪潮分不开。”(Lilian Willens, 1977:71)在18世纪末期西方各国的革命大浪潮下,北美人民面对英国政府的高压政策,反抗情绪高涨。《中国孤儿》通过描写汉族人民坚持本族文化文明,不屈服成吉思汗暴政的故事,有力地控诉了独裁统治的罪恶,直传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在当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成为第一部在北美上演的伏尔泰戏

剧,获得好评如潮。

总之,根据对法国大革命前十年剧院上演数据的统计,对本时期内发生的史料轶事搜集以及结合《中国孤儿》文本的分析,笔者可以总结出此剧有三点尤其鼓舞革命志士:第一,剧中对暴君破坏文学,禁锢思想行径的抨击,引发法国大革命酝酿期间法国知识分子对作为传播启蒙思想媒介的文学作品的保护。第二,剧中对自然权利思想的肯定,宣扬人人自由,引导革命志士不惧死亡。第三,对于正在衰落的专制制度,《中国孤儿》在动员群众参加反暴政斗争方面起了巨大推动作用。总之,《中国孤儿》与革命引发的辩论政治相遇相撞并产生星星火花,在革命酝酿期起着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然而,在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孤儿》的上演场次却惨遭滑铁卢。这样的波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伏尔泰启蒙思想的不彻底性。接下来笔者将分析《中国孤儿》上映场次的骤减与伏尔泰政治观点二元性的因果关系。

3 没落的十年: 1791—1800 年(四场演出)

法国于 1789 年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然而,让人感到奇怪而禁不住细究的是,大革命前夕深受法国人民青睐的《中国孤儿》却在革命爆发后受到观众的摒弃,整个十年仅四场排演。伏尔泰的戏剧作为国家戏剧院索引的经典曲目,在度过了大革命的艰难时期之后,依旧好评不断,不断加演,《中国孤儿》却是一个反差的特例:“革命期间,伏尔泰的 20 多本戏剧从《阿拉第》到《查伊尔》不停地上演加演,共计 1308 场。(……)然而,《中国孤儿》这部在创作过程中获得巨大成功的伏氏悲剧,在整个革命期间却少之又少。”(Ling-Ling Sheu, 2005: 20)《中国孤儿》热度的急剧下降与伏尔泰美化皇帝成吉思汗的开明统治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孤儿》虽然在反对暴政上鼓舞了革命士气,但是,此剧却体现了伏尔泰思想中一些较为消极的地方,也就是其思想中的一种精英理论。他推崇精英治理社会,从某一角度而言也加大了对基层人们的剥削。根据《巴黎 1789 年 12 月 16 日编年史》记载,《中国孤儿》原定于 1789 年的上演计划被强行中端,因为该剧中树立的开明皇帝形象引起了爱国者的愤怒。《法国大革命:当代历史回顾》一书中回顾道:“《爱国者》报刊严格执行 8 月 2 日的法令,禁止所有旨在唤醒皇权贵族思想的戏剧上演。伏尔泰的《阿拉第》《美罗普》《中国孤儿》这三部给予反革命人士复辟已崩塌王朝幻想的戏剧是决计不能上演的。”(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3: 456)《中国孤儿》以中国元朝为背景,描写成吉思汗在统治战争中由最初的杀戮无数,到最终受到儒家哲学感化,赦免中国汉皇帝遗孤的故事。剧中的成吉思汗从穷兵黩武的暴君演变成具有智慧的政治家,最终被当作开明君主的榜样来歌颂。伏尔泰虽然坚持平等自由的思想,但并没有坚决反对君主专制。“伏尔泰和路易王朝的纠葛,典型地说明了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知识界和贵族、王朝的复杂关系。”(刘文立, 1999: 61-68)长期以来,西方哲学研究学者把伏尔泰定为法国启蒙运动中大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言下之意既运动中的右翼。《中国孤儿》中不乏突显伏尔泰温和、保守、妥协的场景,其作为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局限性引导了他对成吉思汗的批判留有一定的余地,例如第二场第五幕成吉思汗的内心独白就引起了革命者的强烈不满:

第二幕 第五场

成吉思汗:

我征战的权利将我推得太远。

希望刀剑封销,希望死亡停止。

希望被征服者从此可以呼吸。

我愿赶走恐惧,带来和平。

(……)

我不想做一个暴君,我的臣民必须生存。(Voltaire, 2009: 153-154)

革命大火的燃烧下,法国人民逐渐发现伏尔泰并不主张废除王权,而是提倡所谓的“开明君主制”。他既痛恨封建专制王权,但又害怕革命,企图用改良的办法取得王权与资产阶级的妥协。因此,《中国孤儿》此剧虽然在上演初期获得成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型的意识形态和开明君主理念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孤儿》的剧末处,儒家思想的“文明社会”同化了成吉思汗的“暴政”,更是集中体现了伏尔泰思想体系的两重性:

第五幕 第六场

伊达美:

为什么我们的处决还没下令?

成吉思汗:

会来的,夫人,你会马上听到。

你给了我正义,我也会还给你正义。

只有在这些地方,我相信我所看到的。

我很佩服你们两位,你们打败了我。

我为我宝座上的胜利感到羞愧

我为你们臣服在我的荣耀之下感到脸红。

(……)

我靠自己成为一个征服者,而你们让我成为一个王。

伊达美:

天啊!我刚听到什么吗?我能相信吗?

答梯:

王,最终,你获得你的荣耀,

啊!你让被征服着反而欣赏你。

伊达美:

是什么激励了你这样的决定?

成吉思汗:

你们的美德。(Voltaire,2009:213)

成吉思汗的“豁然顿悟”代表了伏尔泰主张开明君主的改良主义;答梯和伊达美最终对成吉思汗的认可代表了伏尔泰反对自下而上的革命。伏尔泰虽然反对君主专制,但是并不反对君主制,希望通过开明的君主实行改革。伏尔泰与欧洲一些年轻有为的君主交好,如普鲁士腓特烈二世,俄国叶卡捷琳娜,他们常向伏尔泰征询政治思想意见,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满足资产阶级的一些要求。伏尔泰虽然心知肚明开明君主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在当时确实顺应了时代潮流,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因此,《中国孤儿》中一再出现的妥协倾向,并不是偶然,而是伏尔泰作为上层资产阶级一员保守性的必然表现。柳鸣九打趣地写道:“年少多金的阔绰公子在那个社会里的痛苦,只是不能‘快乐度日’,伏尔泰在封建社会里所感受到的矛盾与十八世纪劳动人民甚至下层市民小资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和压迫,也不能同日而语,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一再表现出软弱性、妥协性的原因。”(柳鸣九,1980:196)大革命前后法国观众对《中国孤儿》态度的急剧转变,其根本原因在于历史进程中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由“改良”变成“革命”;由“保守”变成“激进”。随着大革命期间爱国者怒火的熊熊燃烧,《中国孤儿》中所塑造的“开明君主社会的乌托邦”不再顺应时代的潮流,也因此被观众遗弃。

4 结语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虽以遥远的东方古国作为背景,却映射了西方社会和国家的前途命脉。通过《中国孤儿》在大革命前后十年的上演场次数据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伏尔泰的启蒙思想的矛盾性。首先,伏尔泰将中国题材引入戏剧创作是出于他对中国文化一贯的关切和向往。再次,《中国孤儿》此剧本包涵先进的启蒙思想,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最后,《中国孤儿》体现了伏尔泰的思想两重性,强烈的反封建性与明显的保守性尖锐地同时并存。《中国孤儿》上演场次在革命前的爆发,显示了《中国孤儿》中

攻击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的思想迎合了新型资产阶级的部分需求。革命后十年间的萧条,显示了伏尔泰根深蒂固的精英观念不再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伏尔泰作为资产阶级温和派的主要代表,他攻击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但又害怕革命,寻求王权与资产阶级的妥协。除此之外,《中国孤儿》剧中自然神论,宽容等多方面的新精神,都可集中看作伏尔泰思想二元体系的折射或凝缩,为同领域学者在今后研究中窥见中国元素和法国启蒙社会问题的丝丝联系提供珍贵的文本线索。

参考文献:

- A, Jay, E. Jouy. 1821. *Bibliographie Nouvelle des Contemporains depuis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M]. Paris: Librairie historique.
- Joannidès A. 1901. *La Comédie Française de 1680 à 1900*[M]. Paris: Librairie Plon.
- Lunel Ernest. 1970. *Le Théâtre et la Révolution*[M]. Genève: Slatkine.
- SheuLing-Ling. 2005. *Voltaire et Rousseau dans le Théât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789—1799)* [M]. Bruxelles: édi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3.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Revue d'Histoire Contemporaine* [M]. Paris: Charavay Frère.
- Vilate. 1825. Continuation des Causes Secrètes de la Révolution du 9 au 10 Thermidor. Editeurs *Camille Desmoulins* [G]. Paris: Imprimerie de Fain. .
- Voltaire. 2009. L'Orphelin de la Chine, Tragédie Représentée pour la Première Fois à Paris le 20 août 1755 [G] // Basil Guy. *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 45.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Oxford.
- Willens Lilian. 1977. Voltaire et Amérique. *L'Amérique des Lumières Partie Littéraire du Colloque du Bicentenaire de l'Indépendance Américaine (1776—1976)* [G]. Genève-Paris: Librairie Droz.
- 陈建伟. 2017. 从“纲纪”到“理性”——论伏尔泰《中国孤儿》中的社会政治伦理[J]. 外国文学研究 (3):44-52.
- 黄意明. 2000. 理想中国的图画——伏尔泰的《中国孤儿》[J]. 戏剧艺术 (2):72-78.
- 刘文立. 1999. 法国革命前的三个等级[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61-68.
- 柳鸣九. 1980. 论遗产及其他[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 钱林森. 1988.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中法文学的首次交融[J]. 文艺研究 (2):117-129.
- 孙惠柱. 2004. 西方文化批判者伏尔泰的跨文化戏剧[J]. 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1):27-37.
- 托克维尔. 1992. 旧制度与大革命[M]. 冯棠,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叶坦. 2000. 对伏尔泰及其《中国孤儿》的再认识[J]. 戏剧艺术 (2):67-71.
- 张明明. 2015. 《中华帝国全志》成书历程试探[J]. 国际汉学 (3):92-98.

The Contradiction Philosophy in Voltaire's Tragedy *Orphelin de la Chine*

TANG Guo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Voltaire's tragedy *Orphelin de la Chine*,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wo distinct development processes of this traged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 Drama is the best means to influence directly the masses. It not only points out social problems, but also encourages action. Due to different needs of the audience, the number of performances has also fluctuated in different periods, especiall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is phenomenon shows the two sides of Voltaire's political views, and reflects the essence of French bourgeoisie who opposed the feudal autocratic power but also had fear of the revolution. By sorting out the index of the drama a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fluctuation of the performances of *Orphelin de la Chine*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xploring the deep reasons behind it, and then assessing the social and aesthetic value of this play.

Key words: Voltaire; *Orphelin de la Chine*; French Revolution; enlightenment; duality

责任编辑:肖谊